

龙应台的七个对话：《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读书笔记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龙应台于2009年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该书一问世，立刻在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今年感恩节得空，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一直想读而没有机会读的书，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书367页，分为八个部分，共15万字。历史学家高华在他的读书札记中这样概括该书的内容和特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我个人而言，对这部意象复杂、场面宏大著作的震撼和感动来自作者与七个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的对话。如果说本书实现了“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一成就是通过作者的七个对话取得的。本文拟介绍龙应台的七个对话。

1. 龙应台对话飞力普

第一个对话是在龙应台和儿子飞力普之间展开的。全书的引子题为“找到我”，引子的正文告诉读者最初促使作者决心写作此书的原因正是她儿子希望了解母亲的强烈愿望。“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你把录音机架好……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你没有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啊！……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13-15页）。作者与儿子飞力普的对话为全书提供了一个构架，把所有的故事有机地串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随着新故事的展开母亲和儿子之间有不断的互动。比如128页有：“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再比如135页有：“那是1949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等等。

2. 龙应台对话父母

然而要让飞力普了解作为母亲的自己的身世，首先必须让飞力普了解他的外婆外公，即龙应台的父母，因为他们那一代人亲历了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无数中国人命运的1949，所以第二个对话是龙应台与她父母之间的对话。她母亲应美君是浙江淳安县绸缎庄的女儿。1949年，24岁的美君在战乱中抱着襁褓中的长子告别家乡去投奔执行公务的宪兵连长丈夫，却在辗转一年

半后在万般无奈下忍痛撇下婴儿，从海南岛去了台湾。她父亲龙槐生于1919年出生在湖南衡山一个贫困之家，小时候因为误解把母亲舍不得吃特地留给他的一碗白米饭碰翻地上，15岁时为了有饭吃瞒着母亲冒充18岁应征加入了国民党宪兵队。槐生满18岁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那年他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真的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67页）。国民党溃败时他逃到台湾当了警察，但一辈子珍藏着母亲为他手纳的一双布鞋底。作者与父亲对话最为感人的一幕在“四郎”一节。作者带了八十岁的老父去看京剧《四郎探母》，因为老父一辈子只听这出戏，只唱这出戏。“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老父为什么看这出戏这么动感情呢，因为剧中杨四郎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与老父的重合在一起。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被敌人俘虏，后在辽国娶了敌国的公主为妻，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制，一天在聪慧善良的妻子帮助下潜入交战中的宋营探望了十五年不见的母亲。“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68页）。剧情到这里，龙应台突然觉得身边的老父有点异样，侧头看时，发现他已是老泪纵横，哽咽出声。此时的作者与老父在心中是这样对话的：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与母亲不辞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你打碎了一碗白米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褪色的手纳布鞋底吗？是想到自己和一千年前的杨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苍惶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吗？

3. 龙应台对话外省人

龙应台父母只不过是200多万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外省人”的一个例子。“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75页）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写照。台湾电影导演张曾泽在1949年端午节那天登上“台北轮”到了台湾。那时他是个刚刚加入陆军青年军的十七岁少年。“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79页）。更多的兵是像台湾诗人管管那样被抓去的，“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148页）。1949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绑架的当天，当时十四岁的历史学家张玉发和二哥在湖南栖风渡车站计划去广州。十七岁的哥哥对他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万一两人都完了，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五十年后，南下去台的张玉发才知道，北上的二哥被国军第八军抓去跟云南卢汉的部队作战被俘，变成卢汉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被俘加入解放军，解放军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张玉发兄弟其实是八千个山东中学生中的两个。他们从1948年的徐蚌会战（大陆叫淮海战役）就开始翻山

越岭，风雨苦行。1949年抵达广州码头时的五千人再次投注：姐姐上了船，妹妹就留下。上了船的少年一周后抵达澎湖。因为不满十七岁以上男生须当兵的命令，一位同学被当众刺杀，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等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的七位师长被以匪谍罪枪决，原因是共产党间谍的渗透导致了国民党徐蚌会战失败，蒋介石把防谍作为治理台湾的第一优先。

山东的八千学生南下时，河南南阳也有五千中学生南下。他们到达广西时，剩下一半人，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到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国军97军246团刚好路过，愿意护送学生。溃退中的国军后来被共军追兵的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三万部队的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还有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时剩下不足三百的河南中学生。没想到的是，进入越南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殖民者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在铁丝网内的屈辱和艰苦中出生的婴儿杨天啸，六十年后成了中华民国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是怎么写的啊（106页）？”白先勇、杨百里、马英九、钱穆等人的经历都书写了类似的剧本。难怪龙应台这样概括“外省人”的家史：“战后这一代”台生“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127-128页）。

4. 龙应台对话本省人

在历史大变故中外省人的命运如此，那么台湾本省人的命运又如何呢？陈清山和吴阿吉是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民。1945年12月被前来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台湾的国军70军招为新兵。这些农村少年不仅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然而70军没人懂日语。这些台湾少年都不知道，他们加入国军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内战的泥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246页）。两人在内战的战场上先当国军，后被解放军俘虏又打国军，战后在大陆生活了五十年。对他们来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247页）。

比清山、阿吉年长几岁的蔡新宗和柯景星在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内战，而是二战时的1942。那时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两人用的是日本名字，在学校唱的是日本国歌，受的是“尽忠天皇”、“如要凋谢，必做樱花”的教育。战争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用人、马夫之类。随着战局转为不利日本于1942年开始在台湾招“志愿兵”时，青年人报名踊跃，甚至有人写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决心。蔡新宗和柯景星于1942年应召，被派到位于婆罗洲的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看守敌军俘虏。战后因为涉嫌杀害俘虏，分别被判十年徒刑。

(下接B7版 →)

